

編者序

《東西薈萃：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會的歷程》研究計劃，得到「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的贊助，經歷了幾年時間的籌備、採訪、撰寫、編輯等工作，終於完成了最後一個項目——口述歷史書的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出版《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會口述歷史》這本書，是希望通過受訪者的憶述，介紹天主教會與香港社會於二十世紀同步成長的經歷，記敘教會在過去幾十年的本地化過程，由西方傳入，與中華文化產生衝擊，進而薈萃，並且培養出本地的神職及教友領袖，以至於這個宗教如何以各種服務在香港文化和社會上植根。

本書分為四大主題，分別是教會與社會、教會與文化、教會與堂區，以及教會的女性。

教會與社會：或許受了傳統儒家思想及本土信仰所影響，很多華人，即使是教內信眾，也認為教會只應管祈禱、崇拜禮儀這些心靈之事，不應插足於政治或社會運動。但事實上，教宗良十三世早於 1891 年已發出《新事》通諭，論及工人階級的處境。這份通諭被視為天主教的社會訓導之始。教會社會訓導，是指教會當局對社會狀況作出分析和反省，並提出指引。而香港教會在社會參與上也從不缺席，最明顯是受訪的法籍神父華天祿，他除了是「公教青年職工會」的神師，更曾到工廠打工，成為工人的真正同行者。黃學明則以平信徒工青領袖的身份，細述當年工人運動的參與，以及教會其他相類似的運動對自己的影響。教會對青少年的領袖訓練，也可見於范錦棠神父的故事。他小時在太古樓露德聖母堂的宗教氛圍中長大，後來成為國際運動「樂鋒會」的小領袖，以及「公教學生青年會」神師，積極帶領兒童及學生運動。至於教會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更不用多說。兩位資深教育家儲富有及李崇德分別親述了七十年代以後幾個重大教育政策轉折期，以及「香港明愛」為回應社會的需求，在多區開辦職業訓練學校，以免大量青少年淪為失學者。前明愛社工鍾炳霖則指出，香港明愛被喻為「第二個社會福利署」。這裡除了是指機構龐大，也顯示了其社會服務的強大功能。此外，當環保仍是冷門議題之時，先行者鄭生來神父就已開始培育大眾意識醒覺，推動環保十年如一日。

教會與文化：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全球天主教會因 1963-65 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召開，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禮儀用語由拉丁文改為廣東方言。陶成章神父在梵二前接受司鐸培育，操流利拉丁文是當時能當上神父的其中一個資格。意大利籍宗座外方傳教會杜逸文神父因梵二對禮儀用語的改變，為本地人帶來許多的中文聖樂。來自同一修會的恩保德神父因梵二的改革而受到「頓悟」，由討厭來香港變成渴望成為中國魂。此外，「教會之外無救恩」的教理（即除非領洗入教，否則就算是沒作惡的大善人，死後也會下地獄）也有所轉變，肯定了天主的恩寵可以一種無形獨有的方式賦予非基督徒。本章有些受訪者都曾受早期教理的影響，像來自美國的江天文神父當初成為傳教士，就是抱有皈依華人的念頭。不過他和很多外籍神父修女一樣，並沒有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利用自己的母語在華人社會作育英才。西方宗教傳入華洋雜處的香港，產生文化衝擊之餘，也見融合。徐錦堯神父自小所受的傳統教育和後期的西方司鐸培育，讓他建立起一套糅合了中國哲學的獨特傳教學。隸屬不同國際修會的越南華僑林銘神父及原籍上海的李海龍神父都是因政局動亂而落戶香港。林神父的三重身份，使他成為本地越南難民的慰藉。開創上街遊行傳教的李神父，讀者可能難以想像他是來自冷淡教友家庭，被引領回教會後，進而修道成為神父。

教會與堂區：除了梵二會議為香港天主教會帶來轉變，教會在不同年代也要面對不同的處境。諸如四十至六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重建和內地國共內戰導致大量難民湧入，人口快速增長；七、八十年代製造業發展、經濟起飛，新市鎮的興起，以至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面對香港回歸，市民對前途的信心問題，教會都與社會休戚與共，既是一個傳揚福音的發展機會，也是一個重大的牧民挑戰。在七十年代，比利時籍聖母聖心會士狄和詩神父在舊徙置區七層大廈遊走探訪教友；同會的馬偉良神父以當年仍有限的中文，到偏僻的調景嶺為來自大陸各地的難民教友服務，並見證舊堂區的消失和新堂區的誕生。而意大利籍萬籟寂神父則放下「公教進行社」的行政工作走進堂區，與華人神父一起在荃灣、葵青區的新市鎮建立彌撒中心。天主教會在新界區的最大轉變，莫過於二十世紀初所成立的小堂傳教點，因人口遷移而沒落，部分已杳無人煙。溫以政神父受胡振中主教的委託，肩負起一個特殊任務，就是修葺偏遠離島教堂成為朝聖景點。與此同時，在教會內部，洋人領

導的架構漸趨成熟，交由華人接棒，不少要職改為國籍神父出任。教區中文周報《公教報》，以往由主教把關的編輯之位，交了給駱鏗祥神父。另一邊廂，李國雄神父負責「公教真理學會」，出版各種的教會書籍。不過，在社會潮流改變之下，他亦同時看著宗教書籍印刷量的下降。隨著教會提升對教友牧職的重視，沈禮訓和許多教友一樣，開始充實自己，分擔堂區事務或不同委員會的工作，成了教友時代來臨的見證。

教會的女性：天主教會的架構，時至今天，仍以男性神職人員為主導，地方教會（教區）以主教為最高的領導人。在以聖堂作為行政單位的堂區，往往由神父擔任最高負責人，稱為本堂神父或主任司鐸，許多決策和行動可能都是由神父牽頭或決定。故此整體的訪問對象，難免有所傾斜。為此，我們專闢一個主題為「教會的女性」，借由幾位受訪者的訪談反映出許多女性在教內默默無聞的服務，她們的付出一點都不比男性神職人員少。在七十年代教會快速發展而神父不足以分配的情況下，美籍王美笑修女開創先河，成為堂區負責人，被教友笑稱為「堂區神母」；而意籍梅樂真修女在交通網絡還未成熟的新界原住民村落，早期還要每天奔波守護鄉村教堂。國籍的甘秀玲修女、詹秀璉修女和高慧儀修女，各屬於不同的國際女修會。甘修女用半世紀的時間，言教身教感染有情緒或家庭困難的學生奮發自強。同樣在教育界服務的詹修女，在教育制度未完善的年代，不斷為聽障學生爭取教育權。高修女則在修會的醫院服務。當時教會辦的私家醫院，其實照顧了不少窮人。高修女就是在照顧結核病人期間，自己也染病。有謂「婦女能頂半邊天」，女教友也是撐起教會半邊天的重要群體。七十年代之前，華南總修院（現今聖神修院）到香港仔需要使用水上交通。黃亞妹雖然目不識丁，但負責搖船的她，卻是神父和修士們出入的可靠幫手。因為這特別的工作，她的請求，神父們多半不會推辭。至於梁氏三姊妹領洗入教和成長，是受惠於教會的接濟及修會興辦的義學，而在長大後，自己或孩子以服務回饋教會。

閱讀這三十位的受訪者，如同快速重溫了二十世紀天主教在香港社會上、文化上、生活環境上、甚至思想上的變化，尤其是當中出現的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在教會的環境本來就是互為相關，所以讀者可能會發現某個主題的受訪者也可以放在另一主題，就如修女的教育和醫療工

作，同樣是一種教會的社會參與。許多神父既是堂區發展的見證者，也親身經驗了東西文化薈萃的過程。

當然，單單這些訪問難說是教會的全部。由於時間、人手等因素，限制了我們目前可以發表的內容。事實上，我們訪問的人物，數量遠不止現在所見的三十位。然而，從組織訪談至編撰此書，都不無困難。例如在這段時間內，讓研究團隊最感到可惜的，是多位神長的離世。雖然我們有幸訪問了陶成章及江天文兩位神父，但他們未能看到此書付梓。部分年邁神長，生前貢獻良多，但未及接觸已回歸天家，或因健康狀況已無法接受訪談。「莊稼多，工人少」，致電約訪常常找不到人也為工作增添困難。讓我們感到更為可惜的，是一些神父可能基於謙虛或其他原因，婉拒接受訪問，未能為後人留下歷史印記，或讓教外讀者更多的認識教會在社會中的建樹。另外，能清晰地回憶教會在五十年代以前的狀況的人，可說寥寥無幾。所以這本書充其量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要靠《東西薈萃：二十世紀香港天主教會的歷程》整體計劃的其他項目來補充，例如同於本月出版、以地區劃分作介紹的《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的傳教歷程》小冊子。

顧名思義，口述歷史應把受訪者一字一語都記錄在案，我們亦希望達到「原汁原味」的效果，一方面讓讀者瞭解到外籍傳教士努力學習廣東方言，在港服務多年後的聽說能力（有外籍受訪者甚至能書寫廣東俗語），另一方面也保留各人的說話風格。不過，廣東話在口頭語與書面語之間有相當大差異，考慮到希望這書有機會讓更大的華人讀者群能得到，故我們決定採用書面語，保留少部分的口頭語，以呈現受訪時的情緒和語氣。此外，受訪者提到的個別人物、宗教用語或歷史稱號，可能為年輕一代感到陌生。我們盡量加上簡短註腳作介紹，但著實難以評估讀者的認知，在處理上可能有不足之處。

誠然，這本書仍有可改善的地方，但每個訪問如同聽當事人說故事一樣，都有它引人入勝之處，饒有趣味。我們期待這本書可以作為一個起始，引發讀者對天主教會口述歷史的興趣，有更多有心人加入行列，使得教會的歷史能普及到社會，並且傳承下去。

張小蘭
2019年4月